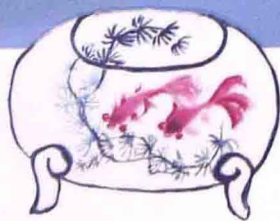


逝者如斯未尝往，看千古
烟波浩荡，听万民

世说清语C

清朝生活图志

王彦章 - 著



身处波诡云谲时代的转折点，
清朝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
是一段中国人重新审视民族文化
的自省过程，是一段守旧
与创新的思想不断交锋的过程，
更是一段关乎
民族生死存亡的蜕变过程。

没有哪个朝代文化上的继承
与创新，需要扛住那么厚重
的历史包袱与那么沉重的时代压力。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说清语

清朝生活图志

王彦章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
古代
生活史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德·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这是中国古代生活史丛书最初的立意及最终的目标。本系列丛书采取文化生活史的视角及讲述方式，向读者介绍现实生活中熟悉之物的历史演变历程，如美食、茶艺、服饰、娱乐等。在致力于用严谨不失趣味的语言向大众还原中国古代历朝各代的生活细节的同时，还能令人对中国历史形成立体、感性的认识，于现实生活中一窥古意之美。

沐来文化
MOLY CULTURE



上架建议：人文 历史

ISBN 978-7-5095-5568-2



9 787509 555682 >

定价：48.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说清语：清朝生活图志 / 王彦章著. — 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14. 10

(中国古代生活史)

ISBN 978-7-5095-5568-2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中国
—清代—图集 IV. ①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9324号

责任编辑：洪 钢

装帧设计：风信子 郑韩樱子

特约编辑：邢小胖

版面制作：屈艳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http://www.cfeph.cn>

E-mail: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010-64033436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65×210毫米 16开 17.5印张 210 000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8.80元

ISBN 978-7-5095-5568-2 / 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热线：88190492 88190446

序 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以历史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如是说：“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①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

^① 参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作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二十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①民情为何“慄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以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是伴随着 20 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爾（Jacques Revel, 1942—）在《法国史》一书中便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

^①代北：古地区名。泛指汉、晋时期的代郡和唐以后的代州北部及以北地区。地理范围在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一带。

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年）在其《1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 15—18 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Michelet, 1798—1874 年）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①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中国社

① 以上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轮美奂，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生活史研究，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西安、上海等地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中 1986 年 10 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在天津召开了中国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起点、新开端，是社会生活史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社会生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中颇为绚丽的篇章，至今方兴未艾，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社会生活史的大型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多资深专家学者撰著的从夏朝至清朝的社会生活史丛书，另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01 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此外较为重要的单册图书有林永匡、王熹的《食道·官道·医道》（1989），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1994），林永匡、王熹的《中国节令史》（1995），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共 8 卷，1996），庄华峰的《中国婚姻史》

(1996)，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1998)，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郭振华的《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1998)，孙立群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3)，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2006)，包铭新的《西域异服：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复原研究》(2007)，萧默的《古代建筑营造之道》(2008)，王景琳的《中国古代寺院生活》(2009)，庄华峰的《魏晋南北朝社会》(2009)，张伯山、张维夏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民俗》(2012)，郭东旭等的《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2012)，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012)，沈泓的《古代生活：民间年画中的脉脉温情》(2013)，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2013)，庄华峰的《中国社会生活史》(2版，2014)等著作，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成果还是相对单薄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当不无关系。

我们觉得，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地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

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然而，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个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读者启迪人生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享、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上海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了一套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丛书，以此来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走进古人的生活。丛书内容涵盖古代衣、食、住、行诸方面，这是一套雅俗共享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彰显古代社会生活的活力和特色。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接地气”的好事，它对于社会生活史研究园地而言，既是锦上添花，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它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故乐而为之序。

庄华峰^①

2014年2月18日于安徽师范大学惜墨斋

^①庄华峰：男，安徽歙县人。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民俗研究、中国经济史，著有《中国婚姻史》《中国社会生活史》等多部著作。曾任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外，对大学书法亦有深入研究，是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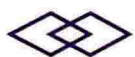
目 录

服饰——穿在身上的历史

剃发易服的血雨腥风	3
留发复衣冠的抗争	10
三寸金莲的殇魂与救赎	16
纷繁复杂男子衣	22
清朝特色女儿装	31

饮食——舌尖上的文化

饮食名家及名作	39
旷古烁今满汉全席	48
南方嘉木耀中华	60
美酒佳酿香天下	66
清代名人饮食趣事	72



建筑——凝固的音乐



重拾京城旧时忆	79
黄罗伞盖下沉睡中的梦	88
湖山话园景中仙	93
敬天祭拜与神游	105
巧夺天工得神髓	112



交通——阡陌纵横皆通达



肩行之车——轿子	120
江北推来独轮车	127
十里洋场黄包车	130
“洋马儿”入中国	135
大众的情人——电车	142
汽车开辟高速时代	149
近代铁路的灰色记忆	153



信仰——超越时空的执着



东方的极乐世界	161
土生土长的精神家园	165
马背上的萨满	170
永恒不灭的灵魂	176
天生万物皆有灵	181
天地幻象仰自然	186

节日——时空以外的时空

正月中旬动帝京	193
玉粽袭香千舸竞	202
一年今日月分明	208
冬至阳生春又来	216
爆竹声中一岁除	221

仪礼——从生到死的轮回

诞儿育女，愉悦欢喜	229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39
姻缘线牵，欢喜悲苦	248
尽礼尽诚，事死如生	257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5



服
饰

穿在身上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华夏”之称，华夏一词的本义源自“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是指华美的服饰，“夏”则指丰富的礼仪。可见，服饰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清朝是汉唐后中国服饰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变化最多，也最为复杂，既保留了汉族服饰中的某些特征，又不失满族的民族特色。清朝男子服饰以满族习俗为准绳，最具特色的是“顶戴花翎”和“黄马褂”，前者是用来分辨品级的官服，后者是统治者用来赏赐大臣的荣誉证明。清朝女子服饰更是花样繁多，“达拉翅”“旗袍”“高底鞋”是清朝满族女子的标志性服饰，独具特色。

服饰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等级森严的清朝社会，“昭名分、辨等威”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来选择服饰，但是清朝的规矩实在太多，因服饰问题而获罪甚至丢掉性命的大有人在，中国其他朝代对服饰的规定则没有如此严厉。

清军入关后，为了压制、淡化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清政府强令汉族男子依照满族的习惯改变原有的服装与发式。在“男从女不从”的规矩之下，汉族女子的服饰保留了明朝习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子服饰满汉交融的痕迹越来越明显，满族女子学习汉服，汉族女子模仿满装。由于满族与汉族之间互相影响，所以清代服饰发生了很多变化。清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特有的服饰制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外国习俗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这在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因此晚清服饰呈现出满汉交融、东西合璧的特色。清朝灭亡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然而传统服饰并没有完全告别人们的生活，清朝服饰的影响依然存在，传统的元素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这在女子旗袍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剃发易服的血雨腥风

关于清朝剃发易服法令的缘由，历来就有很多种说法。据说清太宗皇太极曾命人翻译汉族的书籍，当他看到《金世宗本纪》里金世宗重申禁止女真人仿效汉人衣冠的命令时，心里十分佩服。于是传谕诸王和大臣，不许宽衣博带，沾染汉人的风习。清朝入关之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为了防止族人被汉族同化。

金之俊与“十从十不从”

金之俊是江南吴江（今苏州吴江）人，明朝兵部侍郎。明末农民军攻陷北京后，金之俊投降。清兵攻占北京后，金之俊又投降了清朝，仍旧担任兵部侍郎，后来还当上了大学士。金之俊在清朝当官18年，参与制定了清开国时的许多大政方针。时人给了金之俊这样的评价：“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

金之俊降清前，曾让人传话给摄政王多尔衮说：“我有十个条件，如果能全部接受，我就投降，否则宁愿死。”多尔衮召见金之俊细问之，金之俊便提出了“十从十不从”政策，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税役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多尔衮又问他提出这十个条件的缘由，金之俊就向多尔衮解释，如果清入关之后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必然会受到汉族人的殊死抵抗，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他所说的这十个条件不仅对满人毫无损害，也会让汉人十分乐意，即可以用其中的“不从”来引诱人们顺从。多尔衮见其分析得很有道理，便全部答应了下来，金之俊这才投降。

据说，清初定下的许多重要制度，如旗人不得经商、王公不得私自离开京城、



太监出京者斩之类，都是金之俊为清廷谋划的。后来乾隆帝悟出了其中的奸诈，很想进行改革，但这些已经成了祖宗的定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泄愤，他就把金之俊列入了清朝的“贰臣”行列。

到底有没有“十从十不从”一说，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晚清以来的文人笔记和野史却对其有很多记载。清人徐珂《清稗类钞》里说清初民间流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的说法，还说洪承畴也对清廷提出过“三从三不从”的建议。我们从清朝人的服饰穿戴上看，也确实和“十从十不从”很吻合。

满族人刚进入中原的时候，没有立即对服饰作硬性规定，后来颁布了“易服”法令并强制执行。统治者不仅动用武力强制执行，而且还布告天下国民都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禁就会被立即杀头。就算在自己家中，汉人如果穿了明朝的旧式服装，被人发现后也是必死无疑。清廷后又根据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些特色，对服饰制度进行了修订，于顺治九年（1652年）颁布了《服色肩舆永例》，对文武百官的服饰作了具体规定。后来到了康熙、雍正年间又对服饰制度进行过一些改良。



▲ **马蹄袖特写** 清代男子袍服上身和两袖部分都很合体，特别是袖子颇为窄瘦，其袖端更有特色：在袖尾手腕的位置接有一弧形袖头，形状非常像马蹄，后来汉人常说的“马蹄袖衣”就是指此式袍服。平时将马蹄部分袖头折于手腕之上，行礼时则将其放下，表示谦恭顺服。行完礼再将马蹄袖折起来。